



THE DEVELOPMENT WAY OF
POST-WAR ECONOMIC

Japan

世界主要经济体战后经济发展丛书

丛书主编 李炜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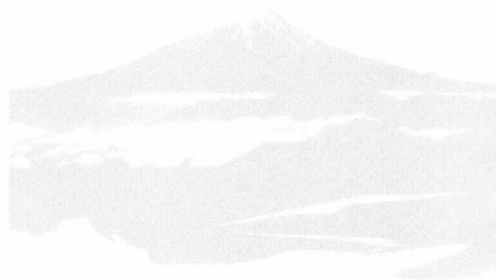
战后经济发展之路

日本篇

董磊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THE DEVELOPMENT WAY OF
POST-WAR ECONOMIC
Japan

世界主要经济体战后经济发展丛书

丛书主编 李炜光



战后经济发展之路

日本篇

董磊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后经济发展之路——日本篇/董磊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 - 7 - 5141 - 1863 - 6

I. ①战… II. ①董… III. ①经济发展 - 研究 - 日本 - 现代 IV. ①F113.4②F13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8952 号

责任编辑: 王冬玲 袁 激

责任校对: 郑淑艳

版式设计: 代小卫

责任印制: 邱 天

战后经济发展之路——日本篇

董 磊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88191537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 × 1000 16 开 14 印张 230000 字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1863 - 6 定价: 3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8819150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成果之一，我以为首先不是 GDP 增长了多少和福利有多大的改善，而是计划经济这种发展模式已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施政选项中排除，不是计划经济的设计本身有多大错，而是凭人类目前的智慧和能力做不到。从客观效果上看，这种集权型的经济体制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损害也委实太大。尽管在一些转型国家，计划体制的思维仍在，体制仍有回潮的可能，但已构不成现实的威胁。

对于计划经济，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在其著作《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中的概括是：“计划的整个综合思想，就本质而言，在方法上是理性主义的，结论上是国家干预主义的。”计划经济不相信自然演进，相反，它把各种资源和要素统统“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以便经济体系能依照有目的的制定且合理协调的政府政策朝着其所要求的方向运动。”保罗·萨缪尔森甚至一再预言，苏联的计划经济将会超过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然而，历史给出的结论却是，自由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加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繁荣和自由。计划经济的两个大本营——苏联和中国也都先后放弃了这个过于理想化的体制，转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人类深刻反省自己的发展道路而得出的经验和结论。

战后世界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并极大地造福于人类，首先应归功于建立在充分尊重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制度。联邦德国

只用了10年不到的时间，就将这个因战败而被彻底摧毁的国家建成欧洲大陆上最强有力的经济体，就是市场经济所创造的奇迹。中东地区的以色列，虽然对经济实施了较广泛的干预，但因为保留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和更多的政治自由，经济发展的情况就要比邻近地区的其他国家更好，如埃及。在远东地区，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也都因广泛地依靠私人市场来发展经济而保持了长时间的繁荣。印度声称废除种姓制度的藩篱，在实践中却进展甚微，但那里还是成批地产生优秀的企业家，特别是政府管制较弱之处，他们成为促进这个难以进步的国家的推动力量。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情形也大致如此，经济自由和人类自由的有无和空间大小，政治权力是不是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从根本上决定着那个地方的经济和社会是繁荣，还是凋敝；是发展，还是蹒跚倒退。

尽管有长时间的市场经济实践，西方学界内部关于自由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问题的争论至今仍然辩驳不清。战后西方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综合起来看，实际上就是一段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相互碰撞的历史，争论主要也是围绕着这两种经济思想进行的。两大辩手哈耶克和凯恩斯分别给出答案，前者是个体自由的捍卫者，认为政府干预市场越频繁，对市场的伤害就越大，“政府应该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后者则认为，政府干预就像是给一部轰轰作响的机器加注润滑油，所以只有对市场进行有效干预，才能使它运转的更加良好。这场争论绵延甚久，改变政府过度干预的政策实践也颇费周折。2007年以后，古典学派和凯恩斯学派的轮番大战再度上演，甚至蔓延到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但自由市场经济这一派并未明显占据上风。几十年来，各国国民收入中用于政府开支的份额一直没有明显下降，有的国家甚至还有所上升。如弗里德曼所说：“控制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政府管制活动，仍然杂芜繁多，并没有多少松动的迹象。”

对凯恩斯主义的否定为何如此不易呢？这是因为2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导致全球经济严重倒退，给整整一代人带来恐慌。这以后，扩大政府职能的主张便得到了更加广泛的认可，也引发了政治和法律层面的变化，其标志性事件是1946年美国《就业法》的颁布，联邦政府被赋予了更多的管理经济的职权，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限制产量，把农产品价格人为地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而在这以前，尽管人们已经认识到市场体系常会发生运行不畅的问题，多数经济学家仍把这种波动归于正常范围，认为经济体系能够自我纠错，就像一个人得了感冒，依靠自身机体的抵抗力也能痊愈。人们产生这种自信是有根据的，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在19世纪末的时候，政府的权力已经受到制度的严格限制，几乎不能集中起什么像样的作用，已威胁到普通公民的财产和人身权利了。而到了30年代，仿佛一切又都回去了，国家建构的努力似乎白费，就像回放一部黑白默语片。

与众不同的凯恩斯，不认为经济体是一个能够自我约束的系统，这个系统是不能“自然而然”地恢复到充分就业的状态里去的。在他的理论推导中，自由市场经济就像一艘海面上行使的船，船舵已然出现破损，海风的吹打使它左右摇摆，已无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平安抵达彼岸。他给出的方案是，在经济衰退期，政府应该大规模借债以提升总需求，并在他的新经济理论中解释了为什么这样做是恰当的。他尤为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认为政府应当通过加大投资——架桥修路，或减税，或给家庭直接增加购买力，来提升对商品和货物的需求，进而引导企业雇佣更多的劳动力。

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用于分割的“大饼”是一成不变的，政府多支出一美元，居民就会少消费一美元。而在凯恩斯学派看来，当私人投资支出过低时，政府就应该用自己的财政支出来替代它。政府额外支出一美元，会把大饼做得更大，从而同时增加

政府和居民两者的可支配收入。在“二战”早期的年代里，政府财政支出的大规模扩张正巧与美国经济大萧条的紧迫局面相合，凯恩斯的灵丹妙药促使经济体从低谷迅速反弹，失业率应声下降到历史的低位上，人均产出最终回到了大萧条之前的水平。这正是凯恩斯主义所要达到的效果。这个理论并不复杂，但实用性极强，更主要的是，它颠覆了古典经济学的很多从来难以撼动的定论，并且影响深远。人们转而认为，大萧条的爆发是自由市场经济失败的结果，他们如此轻而易举地丢弃了本属于自己的自由经济。公众和知识分子对政府与个人之间相对责任的认识最终改变了政治运作结构。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65年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说道：“现在，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如今，凯恩斯的影响力已远不如从前，但也不能否认，他们还有力量。

最近的一次争论发生在蔓延世界各地的本轮金融危机期间，如以往发生的那样，这一次的争论也渗入到政治领域的高层。2008~2009年间，法国总统萨科奇、英国财政大臣达林和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仍在依据凯恩斯主义来解释政府债务大幅度上升的合理性，尽管在此前2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一理论的影响力已经有所下降了。在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奇和德国总理安杰拉·默克尔之间甚至发生了一次公开的争执，萨科奇坚持认为，如果经济陷入泥潭，大量财政赤字是可以接受的。在德国，2009年6月通过了一项平衡财政预算的法案，企图将公共债务减少到零。美国的一些对奥巴马经济政策的批评者则认为，政府并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而是问题本身。

凯恩斯主义有顽强的生命力，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迷失了道路”。实际上，这一理论在战后就逐渐暴露出其缺陷。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因陷入越南战争而难以通过增税来获得财政收入，政府不得不依靠增加借债来支付军费。凯恩斯主义者的预期是，这些预算赤字将首先推动充分就业，然后引发通货膨胀。然而事

实却是，赤字预算政策并没有推动失业率下降，它只是推高了物价水平。1975年，美国的失业率达到9%，而通胀率则高达13%。这就是著名的“滞胀”，这种高通胀与高失业率同时存在的经济现象与凯恩斯理论相矛盾。至少在整个70年代，凯恩斯式的财政政策是失效的，其失败的方式与大萧条时期的经验数据是一致的。这是80年代古典经济学全面回归、由美国引领的全球性大减税运动兴起的主要原因。

大萧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企业不能生产出足够的产品来维持社会充分就业水平，失业者则失去购买商品的能力。凯恩斯认为，总需求主要取决于人们的收入水平，但学者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消费行为的研究，发现这一假设是不对的。事实上，人们是根据自己拥有的财富水平来决定应该花多少钱来购买商品和服务的。弗里德曼曾以他的研究成果向人们证明了这个道理：收入的暂时性波动对消费只有次要的影响，真正重要的是“永久性的收入”，即居民的财富。财富才是决定商品和就业数量的关键因素。当财富数值下降并较为长期地保持在低水平上的时候，居民就很可能削减自己的消费，于是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也就下降了。这个理论对于判断一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有着重要影响。2008年以后，凯恩斯的“幽灵”又一次在世界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上空徘徊，许多经济学家仍然相信恢复充分就业最有效的解决方案仍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这种观点引导着各国的各级政府一次次地大量举债，它所带来的高额成本，换来的只是一时的增长，却使得我们的子孙后代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或者说，相当于后世的税收都被我们这一代人“预征”了。

凯恩斯主义有问题，并不是说古典经济学就十全十美。当离我们最近的这次金融危机降临的时候，古典经济学家对危机的形成原因和治理之道的解答，看上去是如此的无助和无力。麦凯恩在2008年总统大选时说“经济的基本面是健康的”，立即被奥巴

马抓住并受到其激烈抨击。麦凯恩所依据的正是古典经济学的定义。然而他的话音未落，从这一年的秋天开始，经济就开始以令人担忧的速度下滑，并大量流失工作岗位，大批工人失业。实际上，在战后6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有越来越强的趋势，但战后出现的10次经济衰退都没有超过最早的那次大萧条，大多数衰退持续时间都没有超过一年。如一些美国经济学家指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波动的程度比战前小了将近4倍，可见，几乎完全忽略成百上千万投资者之共同信心的因素，以及过分相信市场自我修复的功能而排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这两者共同构成了古典经济学派面对经济领域新问题时所暴露出的缺陷。

尽管如此，在自由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经济这两者中，我们最好还是选择支持前者。因为无论何时何地以何种理由，经济自由都比经济被干预要珍贵得多。政治权力不能高于个体自由，以平等的名义也不行。有经济自由才会有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可保证人们之间相互合作，而不必依靠外部强制和命令，由此政治权力的领域便罕见地被市场所挤压，而变得相对狭小。其次，自由市场有把权力分散化的功能，即便出现某种政治集权，也容易被其“化掉”而难以在人间兴风作浪。值得庆幸的是，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仍然是挽救人类的强有力的手，其力量还可以抵御来自政府的那只“看得见的手”对市场和社会的削弱作用，克服其带来的恶果，只要我们坚持市场经济“100年不动摇”。当然了，100年以后更没有理由动摇。

经验表明，如果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手中，则必然导致专制和暴政。一个一权独大为所欲为的政府，迟早会毁掉自由市场机制所带来的繁荣，葬送人类所有的文明成果。弗里德曼夫妇说，“这一天的到来，也许比我们许多人所预料的要早得多。”在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人们也迟早会明白一

个有关经济和政治自由的最起码的道理：一个被权力过度管制的社会蕴藏着怎样的危险。多少个世纪以来，对于人类最大的威胁并不是通常想象的战争和自然灾害，而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人们总是受其所害，却总是不能醒悟。

不管怎样的难，人类总还是有能力找到一种既能纠正市场经济的弊端和弥补制度的缺陷，同时保留自由市场经济的长处方案：既不限制个体自由和压制企业家创业与创新的热情，也不会导致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低效率和资源浪费。此为人类社会需长期面对的两难问题，人们要获得答案，只有不断探索。相比之下，我们对自己的了解要比对欧洲、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了解多得多，这妨碍了我们正确理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真谛，所以需要有人做研究和介绍的工作。

我的同事董磊所计划完成的这部《战后经济发展史》丛书，就是从战后国别经济发展史这个角度，对自由市场经济和合理的政府干预的问题所做的有益探索。他是个有想法、有志向的年轻人，暑假在苏州一带旅行期间，他告诉我，为了写这本书，他每天要将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材料汇总排列，对着它们冥思苦想，然后下笔写上几行。确实，战后近70年的历史波澜壮阔又丰富多彩，很多事件都极具启发性，都值得详加考证。由此可见他具备做学者的基本素质，那就是锲而不舍。如此坚持下去，我相信他必有收获，而且必有信仰蕴含其中。他一定会把事情做好的，所以我选择支持他。

李炜光

2012年8月19日

目 录

20 世纪 40 年代

在一片焦土上和美国的军事管理下，曾经“疯狂”地想征服亚洲的日本回归到了正常发展的轨道之上。虽然因为亚洲政治局势的原因，美国并没有帮助日本完全认清其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罪行，但在美国的引导下日本还是顺利地走上了君主立宪的民主之路。这一切都为日本之后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 1945 年 在废墟上 1
- 1946 年 物资匮乏 5
- 1947 年 法制 8
- 1948 年 转机 10
- 1949 年 道奇计划 13

20 世纪 50 年代

朝鲜战争的爆发为日本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在成为了美国的亚洲新盟友后，日本的财阀得以再次集结，这个曾经在“二战”期间制造了亚洲最强大空军和海军的工业机器重新运转了起来。随着“神武景气”和“岩户景气”的成功，日本经济再次崛起，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已经初具雏形。

- 1950 年 特需经济 17
- 1951 年 结盟 20
- 1952 年 扶持 22
- 1953 年 战后萧条与新财阀 25
- 1954 年 给食法 28
- 1955 年 神武景气 30

- 1956年 已经不是战后 33
 1957年 紧缩 36
 1958年 岩户景气 38
 1959年 顺差与三件神器 41

20世纪60年代

日本的普通劳动者们享受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而人民收入的增加又有效地促进了国内市场的繁荣。随着“新三件神器”的逐步普及，日本的企业和消费者都切身地感受到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的喜悦。与经济的增长同步，日本的文化也在战后迎来了新的繁荣，“made in Japan”的动画片和川端康成成为了向全世界宣传日本文化的代表。此时的日本，正在享受“世界第二”所带来的赞扬和荣耀。

- 1960年 收入倍增计划 45
 1961年 日本制造与变革 48
 1962年 《惊人的日本》 50
 1963年 奥运景气与东方文化 53
 1964年 富人俱乐部 56
 1965年 结构性萧条 59
 1966年 地价与“伊奘诺景气” 61
 1967年 自由化 64
 1968年 日本第二 67
 1969年 新三件神器 70

20世纪70年代

一场突如其来的石油危机让日本彻底偏离了经济增长的轨道，日本政府为了缓解“滞胀”的压力，不得不增加财政支出来刺激经济增长。同时，日本独特的企业经营模式也成为帮助日本企业们度过难关的重要保障。但是，已经脱离了轨道的日本却找不到回归之路了，日本经济的命运也从此开始画出另一番景色。

- 1970年 日本式造车热 73
 1971年 尼克松冲击 76
 1972年 列岛改造论 78
 1973年 第一次石油危机 81

目 录

- 1974年 滞胀与春斗 83
1975年 萧条 86
1976年 日本式经营 1 89
1977年 日本式经营 2 92
1978年 第二次石油危机 94
1979年 日本第一 97

20世纪80年代

在强大的日本制造背后，是迟迟未能走上国际化的日本金融业。正因如此，在80年代美国对日本发起金融战之时，日本便踏上了一条从“疯狂”到“毁灭”的绝路。曾经谦虚、谨慎的日本企业被推高的日元冲昏了头脑，日本各界共同创造了一个用日元购买世界的“幻觉”，并又亲手将其刺破。

- 1980年 技术立国 101
1981年 贸易摩擦 104
1982年 到海外去 107
1983年 民营化 110
1984年 金融改革 113
1985年 广场协定 116
1986年 《前川报告》 119
1987年 双宽松 122
1988年 疯狂的地价 124
1989年 平成绝唱 127

20世纪90年代

经济泡沫的破裂让日本的经济神话就此终结。就在日本与“失去的十年”苦苦战斗之时，一场发生在日本后院的亚洲金融危机突然爆发，一直被日本津津乐道的“雁行模式”也画上了句号。被汇率战彻底击败的日本重新回到了原点，日本经济就此与“快速发展”分道扬镳。

- 1990年 崩盘 131
1991年 失去的十年 134

1992年	神话破灭	137
1993年	紧急对策	140
1994年	和服金融家	142
1995年	天灾、人祸	145
1996年	艰难的复苏和衰弱的头雁	148
1997年	一筐破鸡蛋	152
1998年	王者归来	155
1999年	打回原点	158

21 世纪

在老龄化和高日元的压力下，日本企业走上了内生增长之路，日本经济的健康度在如蜗牛般缓慢增长的同时也渐渐恢复。同时，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为日本企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日本人找到了利用控制资源和渠道来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方法。放弃了增长速度，也放弃了“世界第二”经济体交椅的日本，其对亚洲经济发展的控制力在悄悄地增强。

2000年	信息化	163
2001年	超宽松与“大银行”	167
2002年	年老的日本	170
2003年	中国特需	173
2004年	复苏	176
2005年	达摩克利斯之剑	178
2006年	内生增长和局部景气	181
2007年	邮政民营化与年金黑洞	183
2008年	日本的宿命	186
2009年	收复失地	188
2010年	舍与得	191
2011年	没有新闻的日本	194
2012年	步步惊心	198

参考文献 203

致谢 206

20 世纪

40 年代

在一片焦土上和美国的军事管理下，曾经“疯狂”地想征服亚洲的日本回归到了正常发展的轨道之上。虽然因为亚洲政治局势的原因，美国并没有帮助日本完全认清其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罪行，但在美国的引导下日本还是顺利地走上了君主立宪的民主之路。这一切都为日本之后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1945 年 在废墟上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宣布停战。9 月 2 日，日本政府代表在美国战舰“密苏里”号的甲板上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结束。虽然日本本土没有成为“二战”的直接战场，但是在遭受了美国长达 1 年多的空中轰炸，特别是 1945 年 8 月 6 日、9 日分别于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袭击后，日本本土几乎所有的工业设施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日本战败时，其工业生产能力仅为 1941 年的 1/7，粮食严重缺乏，恩格尔系数高达

60%，政府按照配给价格向公民出售粮食，每人每天只能获得 250 克大米。^①

9 月 14 日，麦克阿瑟领导的盟军总司令部（SCAP）进驻东京，开始了对日本的军事占领。日本战败后，11 个国家在华盛顿特区成立了远东委员会（FEC），负责制定亚洲战后策略。在远东委员会之下，设立了对日理事会（ACJ），并制定了盟军最高司令一职来负责处理日常占领事务。麦克阿瑟就任了盟军最高司令一职，日本用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来称呼麦克阿瑟领导的团队。虽然按照盟军战后的协议，对日本的处理主要由美国、苏联、中国和澳大利亚共同执行，但是自 GHQ 设立后，美国就成为了处理日本战后事务的主导国家，也可以说是唯一的国家。

在到达日本后，麦克阿瑟和裕仁天皇的第一次会晤是在作为麦克阿瑟私人住所的美国大使馆进行的。即使如此重要的会见，与裕仁天皇正装出席相对，麦克阿瑟则是身穿卡其布军装，甚至未打领带。这一细节既和麦克阿瑟张扬的个性有关，又可以看出美国作为战胜国对日本的强势态度，日本战败后政治、经济的发展自此便与美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作为日本战后实际的最高统治者，麦克阿瑟的权力和对日本的影响意义极大，他有权解散议会、检查出版物、取缔政党以及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命令。

以中国人的价值观来判断，此时的日本已然完全成为美国的殖民地，麦克阿瑟则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但是日本人则不完全这样理解。从日本历史来看，天皇失去管理国家的能力和权力，而由强势的幕府来控制国家的情况在日本是非常常见的，只不过是战后出现了一个蓝眼睛的幕府将军而已。日本独特的历史为 GHQ 在战后初期管理日本提供了非常良好的环境。

由于日本一直有“虚君”的传统，并且 GHQ 并没有废除天皇和解散日本自有的官僚体系，所以“二战”时受到军部排挤和迫害的日本“反战”势力迅速进入政府（这些“二战”时与军部意见相左的人并没有被日本人看作是“日奸”），成为与 GHQ 平行的、对日本进行改造的重要势力。天皇则自明治维新获得权力后再次失去了实权，仅仅成为了一个象征。

日本战后独特的政治体系对其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

^① 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7 ~ 68 页。

虽然 GHQ 掌握了各种资源并且处于绝对支配的地位，但是负责政策执行的日本官僚系统则在实施层面加入了本土色彩。故此，与其说美国在战后对日本实行了短期的统治，不如说美国为日本和平派和民主派官员创造了一个实现其理念的环境。日本战后的改革也因此基本上是由日本人自己主导完成的。

这里还需要再交代一些细节。日本和德国作为“二战”的战败国都接受了盟军的管制，盟军在两国都采用了以本国人治理本国的方法，但是这其中却有一点点不同。德国“二战”后的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在“二战”期间是坚决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因此他两次入狱并受尽折磨。康拉德·阿登纳成为德国总理后在德国国内执行了极为严格的反法西斯化运动，德国人因此对其政府在“二战”中的罪行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反观日本，在经历了由皇族将军东久迩稔彦的短暂过渡内阁后，币原喜重郎和吉田茂分别于 1945 年 10 月和 1946 年 5 月成为内阁首相。虽然币原喜重郎和吉田茂在“二战”时期都曾是日本国内反战的“鸽派”，但是其二人都只是认为军部选择对美宣战是最大的错误，并且由于对美宣战而使得日本在亚洲的利益受损。因此，日本虽然承认了失败，但是国内“极右翼”势力并未像德国一样灭绝，这也使得日本对于“二战”的反思远没有德国透彻，为之后中日两国的外交矛盾埋下了伏笔。

虽然日本天皇和国内的官僚体系没有被 GHQ 废除，但是 GHQ 对日本的改革力度还是极大的。基于日本在“二战”期间对所有亚洲国家所进行的侵略，GHQ 将统治日本的目标设定为：让日本维持在 1920 年农业社会的经济水平。为了达到这个目标，GHQ 要求将日本本土的工业设施拆除，并将这些设施运往被日本侵略过的亚洲国际，以此作为对战争受害国的补偿。为了彻底瓦解日本军国主义复苏的可能，GHQ 严格限制日本工业的发展，限制一切与军事相关的重工业企业生产甚至还禁止日本生产汽车（但经日本政府争取，GHQ 允许每月生产 1 500 辆卡车来运输物资）。

GHQ 对日本改造的第一步是将日本从军事独裁国家变为一个民主国家。11 月，GHQ 开始对日本进行民主改革，其向币原首相下达“五大改革的指令”，要求：赋予妇女参政权；鼓励成立工会组织；实行教育自由化；废除专制机构；促进经济制度民主化。

作为废除日本国内专制机构和促进经济制度民主化的第一步，GHQ 将